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李怡
沈衛威◎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9

日本留學與 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

劉婉明·著

文化與
民國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李怡 沈衛威 主編

第 9 冊

日本留學與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

劉婉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留學與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劉婉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220 面；19×26 公分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編；第9冊)

ISBN 978-986-322-803-5 (精裝)

1.中國文學 2.國家認同 3.文學評論

541.26208

103012904

特邀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 帆	王德威	宋如珊
岩佐昌暲	奚 密	張中良
張堂錡	張福貴	須文蔚
馮 鐵	劉秀美	

ISBN-978-986-322-803-5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 編 第 九 冊

ISBN : 978-986-322-803-5

日本留學與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

作 者 劉婉明

主 編 李怡 沈衛威

企 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初 版 2014年9月

定 價 四編 12冊 (精裝) 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緒論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留學潮對創造社作家國家想像之影響	15
第一節 立身入世的熱望與富國強兵的追求：留學之動因	16
第二節 靠不住的官費：留學制度與民初留學經費恐慌對創造社作家國家觀念之影響	27
結語	44
第二章 亡國滅種之觀念：國家意識的成型	45
第一節 國家·種族·民族	45
第二節 國民國家的登場	54
第三節 「我是支那人」	69
結語	79
第三章 作為「東方」的中國：還鄉敘事與國家想像的分裂	83
第一節 上海印象：觀看中國的方式	84
第二節 鄉愁：想像中國的方法	100
結語	108
第四章 反抗國家的個體	111
第一節 去國者	112
第二節 混血兒	126
第三節 被放逐的吟遊詩人	133
第四節 反思國家主義	140
結語	153
第五章 「國民文學」的譜系：「民族」與「國家」之分離及民族國家之再認同	155
第一節 「國民文學」的提出	156
第二節 與《語絲》派的「國民文學」論爭	166
第三節 「純詩」追求與「國民文學」：穆木天和馮乃超的實踐	174
結語	198
結論	201
主要參考文獻	209

緒論

一、研究綜述

創造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話題，縱觀目前學界對創造社的研究狀況，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大領域：作為浪漫主義（前、中期）和左翼文學（後期）的創造社研究（文學思潮角度），作為留日學生文學團體的創造社研究（比較文學角度），以及作為「五四」運動的產物——新文學社團的創造社研究（文學場角度）等。

創造社元老之一的鄭伯奇 1935 年在為專門收錄創造社作品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所撰導言中，將長年的留學生活視為影響創造社作家文學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歸結出浪漫主義和「移民文學」兩大特徵。

創造社的作家傾向到浪漫主義和這一系統的思想並不是沒有原故的。第一，他們都是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中國的（次殖民地）病痛都看得比較清楚；他們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對於現社會發生厭倦憎惡。而國內國外所加給他們的重重壓迫只堅強了他們反抗的心情。第二，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祖國便常生起一種懷鄉病；而回國以後的種種失望，更使他們感到空虛。未回國以前，他們是悲哀懷念；既回國以後，他們又變成悲憤激越；便是這個道理。第三，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長久，當時外國流行的思想自然會影響到他們。哲學上，理知主義的破產；文學上，自然主義的失敗，這也使他們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註 1〕

〔註 1〕 鄭伯奇《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頁。

成立強曾指出，鄭伯奇的這篇導言及其後的一系列回憶文章，構成了所謂「鄭伯奇模式」，「從文學思潮、創作主張及成員與社團關係，對前期創造社首次進行了全面梳理，將創造社的文學傾向定位在浪漫主義，並將其發生源歸之於海外留學的影響」。這一模式以郭沫若的敘述為基點展開，「將郭沫若敘述的個人性替換成社團性」。創造社研究正是由此開始了「經典化」，「核心即是將創造社定性為一個不斷向著革命陣營轉變的鬥爭群體」。^{〔註2〕}雖然鄭伯奇的創造社論說中的確有成立強所指出的過於依賴郭沫若個人敘述的痕迹，但鄭伯奇提出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和留日學生的文學這兩點，的確捕捉到了創造社最重要的特質，通觀此後數十年的創造社研究，也正是從這兩點出發進行的。

1979年日本出版的由伊藤虎丸主編的十卷本《創造社資料》，按出版時間順序收錄了包括《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周刊、《洪水》半月刊、《A11》、《新消息》、《創造月刊》等從創造社成立到「革命文學」運動之前的前、中期刊物影印本。作為別卷出版的《創造社研究》則收錄了何畏、郁達夫、穆木天、馮乃超等部分創造社同人的東京帝國大學在學證明書照片，伊藤虎丸撰《創造社小史》、《作為問題的創造社》，小谷一郎編《創造社年表》（附注及所據資料一覽目錄）、《創造社期刊總目》、《創造社期刊總目著者別索引》。這些資料、研究論文至今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伊藤虎丸《作為問題的創造社》一文匯集了作者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對於創造社研究中一些關鍵問題的思考，拓展了「鄭伯奇模式」，提出討論創造社問題的三個關鍵詞：大正、日本、留學生，將創造社定位於在日本的大正時代度過青春期的中國留學生所組成的團體，由此展開研究，考察了三個問題：1、創造社從大正日本文學中吸收了什麼？2、從受日本文學影響的角度看，創造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處的位置和作用是什麼樣的？3、創造社的文學與同時代的日本文學間又有怎樣的分歧和斷裂？^{〔註3〕}

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伊藤虎丸首先歸納出「對現代的憧憬和民族的屈辱

〔註2〕 成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3頁。

〔註3〕 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東京：アジア出版，1979年，第51頁。

感」兩點，作為創造社所受的最重要的日本影響。他引入大正時代日本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指出作為「大正時期留日學生」的創造社作家，受到了當時正迅速現代化、都市化的大正日本社會風氣，包括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表現主義、世紀末文學，乃至福本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等諸多流派在內的日本文學思潮，以及高等學校—帝國大學（簡稱「帝高系統」）出身者的精英意識影響。與此同時，還有因目睹日本的「現代」而生的對中國的「落後」的焦慮，以及因日本侵華、日本人對華歧視而生的民族屈辱感。伊藤虎丸還引入了內田義彥的「明治青年」／「政治青年」、「大正青年」／「文學青年」、「大正·昭和青年」／「社會青年」的分類模型。根據內田的理論，「明治青年」經歷了從明治初年（19世紀60年代）自由民權運動，到明治二十年代（19世紀80年代）的民族主義時代，形成了所謂「道德反骨」，在看待「我」與國家的關係時，他們視自己為國家的一員，以「我」之獨立為國家之獨立的絕對條件，是積極參與國家意志的「政治能動者」。而「文學青年」成長於日俄戰爭後濃郁的軍國主義氛圍中，這時的國家已經成為一種「不動的體制」，他們的「自我」是通過逃避於國家體制之外而確立的。借助於內田義彥的學說，伊藤認為，明治期留學日本的魯迅與「政治青年」頗為相似，大正、昭和期留學日本的創造社作家則散發著「文學青年」、「社會青年」氣質，這也成為雙方日後在對於「個人」、「民族主義」、「文學」與「實學」關係、對「天才」、「現實主義」的看法等問題上出現分歧的重要原因。

伊藤虎丸從不諱言竹內好對自己的影響，他的創造社研究亦以竹內好的「日中現代之比較」問題為起點，即通過比較同樣以西方衝擊（western impact）為契機開始的，中日兩國現代化的不同，從而反思日本的現代化過程。（註4）因此，他的創造社研究中關注的「個人」與「國家」、「民族主義」、「文學」與「實學」關係、創造社與魯迅之比較、創造社與同時代大正日本作家的比較等問題，亦是立足於上述框架提出的。此外，當時的伊藤虎丸還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文中使用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思考方式和術語。如他在考察創造社與同時代日本文學的不同乃至對立時，論說二者一方面共同以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矛盾深化」為文學基礎，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日益加劇，導致兩國文學分別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兩

〔註4〕伊藤虎丸《魯迅と内村鑑三》，《近代の精神と中國現代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第203～204頁。

個側面』。(註5) 後者被伊藤視為造成創造社與同時代日本文學之間根本矛盾的原因。伊藤虎丸有關創造社的這些論文後被譯成中文，收入《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目前在對「創造社與日本」這一問題的研究中，無論中日兩國，「伊藤虎丸模式」一直起著支配性的影響力。

中國大陸學界在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學術界對文學思潮、社團研究興趣增強，開始了對作為社團的創造社原始資料整理和社史的寫作。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1985）、陳青生、陳永志《創造社記程》（1989）等是這方面的先驅之作。

朱壽桐《情緒：創造社的詩學宇宙》試圖突破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學界創造社研究中的浪漫主義框架，以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分析模式，從審美心理學角度介入，使用「情緒」一詞，試圖總括創造社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各種「主義」，建構由「情緒」表現所構成的創造社的「詩學宇宙」。(註6)

黃淳浩《創造社：別求新聲於異邦》是採用馬克思主義文學史觀立場所作的創造社史。全書主要由對創造社歷史和文學觀念轉化過程的線性描述，以及對主要成員代表作品的分析評述構成。由於該書主要是對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代表的創造社史的敘述，同時受材料所限，並未對創造社成員中的留日群體進行單獨考察，對他們的在日活動主要依憑成員的回憶敘述，對作品所表現出的國家意識，簡泛地概括稱為愛國主義和反帝反封建意識等，此外並未做更深入的考察。(註7)

劉納《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以創造社與泰東書局從合作到分裂的關係為主線，從編輯出版角度考察了新文學運動後的出版界是如何對包括創造社在內的文學界發生影響，而創造社又是如何通過依託出版界，以雜誌為媒介，進行同人文學社團運作，在「五四」後的新文學界形成了自己的「勢」。(註8)

靳明全《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中描述了日本大正

〔註5〕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東京：アジア出版，1979年，第48頁。

〔註6〕朱壽桐《情緒：創造社的詩學宇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

〔註7〕黃淳浩《創造社：別求新聲於異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註8〕劉納《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時期的自然主義文學和「私小說」，以及當時文壇上流行的崇尚個性、天才的浪漫主義風氣對前期創造社成員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早期創作的影響。舉田山花袋、島崎藤村、武者小路實篤、芥川龍之介、志賀直哉、菊池寬、佐藤春夫等人的作品與郭、郁、張三人作品進行平行比較，指出前者對後者在描寫方法、敘述手段等方面的影響。認為來自日本文學的這種影響對郭、郁、張三人將浪漫主義移植到中國文壇至關重要，「創造社的這種浪漫主義是觀照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私小說而形成的」。（註9）

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以「體驗」為關鍵詞，著意於考察在日本留學或生活的「體驗」是如何通過影響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世界」的方式，從而影響中國新文學的發生。作者採用「體驗」一詞，著力論說中國新文學的發生並非被動接受日本「影響」的產物，而是主動「體驗」的結果。論及創造社成員的留日體驗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則基本仍在伊藤虎丸模式內：如書中所敘大正日本的摩登社會和蔓延其中的世紀末頹廢情緒對創造社作家現代個體意識形成之影響，創造社的「國家民族焦慮」與「自我焦慮」的混合，從《沉淪》中讀出「個人生存欲望與國家民族大義的直接對接」，創造社的「個人／國家『對接』」與魯迅的先「立人」（國民性改造）再「立國」的優劣比較等等。（註10）

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力圖擺脫「鄭伯奇模式」的影響，運用文學場考察的方法，以創造社出版部成立前後為敘述主軸，嘗試將研究對象定位於包括所有社員在內的作為「社團」的創造社，而非以往的以郭、郁、成等主要成員為代表的創造社，整理出了一份詳細的創造社全體同人名單。在對創造社成員精神氣質的定位上，作者選擇「流浪」為關鍵詞，使用薩義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知識分子「流亡處境」理論，將創造社成員定位為「流浪型知識分子」。由於咸立強研究的重點在創造社歸國之後，對留日時代著墨不多，基本是根據同人回憶進行的概述，未做深入討論。

童曉薇《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之路》觸及了清末學堂教育改革和清末民初留學潮對創造社日本留學的推動作用，對創造社留日時代日本社會和文壇的狀況也作了較詳細的描述，其中對大正日本社會文化和文壇對創造社

〔註9〕 靳明全《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註10〕 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現代自我意識產生之影響的分析，可以看出是在伊藤虎丸《作為問題的創造社》和小谷一郎《田漢與日本》等研究的延長線上進行的。作者在序言中表示該書是「以郭沫若和他的朋友們的文學發展之路為中心，從少年時期的文學啓蒙到留學日本、回國創業，從他們相識、結合、攜手直到分離的歷史還原」。全書重點在敘述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張資平等前期成員的留日前後和回國之初的活動，特別是後半部分涉及創造社回國後創作、活動時，止於基本史實的重複敘述和刊物目錄的羅列，未能超出目前學界對於創造社史的基本認識。（註11）

除了上述以整個創造社為對象的研究外，幾部以前期創造社單個成員為對象的專著也為創造社研究貢獻了豐富的史料和一些獨到的觀點。

稻葉昭二著《郁達夫：青春與詩》以郁達夫旅日之初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時期的學習、交友、生活狀況為中心。書中對郁達夫長兄郁華旅日時代與日本文人之交往，郁達夫與服部擔風、富長覺夢等日本漢詩人的詩文交往有較為詳細的考證。此外並收錄了富長覺夢所著《服部擔風先生雜記》中述及郁達夫的部分，以及郁達夫在八高、東京帝大時代的同學、朋友福田武雄有關郁達夫事致稻葉昭二的書信兩封，為研究郁達夫留日早期的生活提供了珍貴的材料。（註12）

小谷一郎和劉平共同編輯的《田漢在日本》是一部有關田漢與日本關係的詳實豐富的資料集。全書由三大部分組成：田漢本人寫作的有關日本的作品；村松梢風、谷崎潤一郎、金子光晴、佐藤春夫、小牧近江、山口慎一等日本文人寫作的與田漢有關的作品；劉平、小谷一郎共同編寫的《田漢留學日本大事記》、小谷一郎編寫的《田漢與同時代日本作家交流大事記》、以及小谷一郎撰《田漢與日本》的研究文章。小谷所撰《田漢與日本》以田漢與日本關係為中心考察了幾個問題，這些問題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對有關田漢生平的幾個問題的考證，包括訂正了田漢傳記中因田漢本人的誤記、誤釋而導致的一些錯誤認識，如田漢1927年再度赴日的確切時間，田漢初次觀看的「近代劇」——由「松居松葉編劇並導演」的《神主之女》的原作問題，田漢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入學時間問題，田漢舅父易梅園與神州學會、李大釗

〔註11〕 童曉薇《日本影響下的創造社文學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註12〕 稻葉昭二《郁達夫：その青春と詩》，東京：東方書店，1982年。

的關係及對田漢的影響，關於田漢與易漱瑜留日時代居住過的「月印精舍」的考證等。第二類是大正日本社會對田漢文學思想、創作和人格形成的影響。包括田漢加入的少年中國學會與東京帝大新人會在宗旨、思想上之共通關係；田漢留學時期如何通過電影這一當時最現代的媒介，接觸了大正日本的都會文化；留日時代對「近代劇」和新浪漫主義的接受；《咖啡店之一夜》的背景等。第三類是有關田漢與日本作家交往之考證。包括田漢與佐藤春夫、村松梢風、谷崎潤一郎等日本文人的交往，1927年田漢以南京政府總政治部宣傳處藝術科顧問、電影股長的身份再度赴日時，與日本文化界的交流等問題。（註13）

武繼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以郭沫若1914～1924年十年留日生活為考察對象，分為「留日生活考證篇」和「作品、思想論考篇」。該書對郭沫若研究最大貢獻之處在於作者以史證方法，詳細考證了從郭沫若赴日之初備考官費，到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和九州帝國大學期間的學習、生活情況、師友關係等。作者使用大量第一手資料，清理了郭沫若留日時代許多一直以來為人所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細節，如對郭第一次抵達岡山日期的考證、在岡山的住處考證、九州帝大的課程設置與學制變更對郭沫若棄醫從文之影響、福岡時代數次遷居所反映出的郭沫若貧困處境對其性格、創作之影響等。「作品、思想論考篇」考察了1914～1924年間郭沫若的詩歌、小說創作和傳統文化觀。作者分析郭沫若「前《女神》時期」（赴日留學至創作《女神》之前）的詩作時指出，其中既存在著以傳統士大夫入世思想為根基的「愛國主義思想」，也存在著覺醒了的現代自我與國家意識的衝突。《女神》通過使用太陽、大海、光明這些郭沫若在博多岸邊提煉出的新意象，勾畫出一個有別於傳統詩歌以及初期白話詩的雄渾魄大的世界，為「五四」時代的青年帶來了個人與國家，小我與大我融合的明亮圖景，在這幅圖景中，個體的新生將帶來國家的新生。從這一意義上說，《女神》是郭沫若「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物。（註14）

嚴安生著《陶晶孫：多舛的生涯》是以「大正教養主義與舊制高等學校教育」為背景寫作的陶晶孫傳。由於作者多年專攻近現代中國人的日本留學史，因此能在較為詳實周備的史料基礎上，詳細考察作為中國留學生的陶晶

〔註13〕 劉平、小谷一郎編《田漢在日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註14〕 武繼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

孫在日本所受的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對其人格、創作的影響，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視為對伊藤虎丸當年提出的「帝高系統」教育對創造社影響問題的深入展開。該書雖然是陶晶孫的個人傳記，但其中涉及的大正教養主義、舊制高校教育等對研究其他旅日創造社成員，以及整個旅日創造社團體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註15）

二、問題的提出、研究方法及意義

作為一個「五四」時代在文壇上「異軍突起」的，由留日學生發起的文學團體，對創造社的研究，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他們的日本留學。如陶晶孫所言：「使得產生這一批文學同人，不可疑的是他們的日本留學，和日本文學界的影響（可是並不是日本文學或日本文學作家的影響）。」（註16）鄭伯奇提出的浪漫主義和「移民文學」兩大特徵，也是從創造社的「留日學生」團體屬性中總結出的。從上述學界研究狀況來看，對創造社與日本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由伊藤虎丸提出的日本現代都市文化、大正日本文學中流行的「藝術家意識」、以及「帝高系統」的精英意識對創造社成員的影響；從日本輸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創造社轉向的影響，艾曉明和小谷一郎在這一問題上取得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前者注目於考察理論的輸入和思想的影響，（註17）後者則著力於成員旅日時代活動的史料之整理。（註18）

本文將嘗試綜合上述研究成果，討論日本留學經歷是如何影響了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作為當事人的陶晶孫事後回眸，曾指出創造社的作家們因長年留學而生懷鄉病，由懷鄉病帶來的幻覺與幻視中生出了浪漫主義，而這浪漫主義又是國家意識、國民熱情和自我意識三者作用的結果：「羅曼主義是國家意識昂揚時代的國民的熱情之反映，所以羅曼主義者慣以飛躍的精神，走著向上之路，也不忘自我之意識。」（註19）陶晶孫這段鮮為人所注意的文

〔註15〕嚴安生《陶晶孫 その數奇な生涯》，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

〔註16〕陶晶孫《創造三年》，《牛骨集》，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第171頁。

〔註17〕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註18〕小谷一郎《四・一二クーデター前後における第三期創造者同人の動向——留日學生運動とのかかわりから》，《中國文化：研究と教育：漢文學會會報》，1982年第40號。

〔註19〕陶晶孫《記創造社》，《牛骨集》，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第154頁。

章揭示出創造社的浪漫主義裏個體與國家、國民間令人深思的關聯之處，更提示了「國家」是理解創造社的一個重要切入口。然而，由於被視為崇尚「自我」的文學團體，在涉及與國家、民族共同體的關係問題時，大部分研究止於將之歸結為「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有關留日創造社作家國家意識的產生、國家想像的形成和嬗變是目前研究中一個經常被提到卻較少得到深入的問題。例如，經常被提到的一點是，創造社作家喜歡將他們個人的不幸與國家、民族的不幸聯繫在一起（《沉淪》常常被舉為例證），將個人的屈辱與國家民族的大義相連接，將性的壓抑歸結為民族的被壓迫等等。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創造社作家總是將個人與國家、民族相聯繫？如果他們是「愛國主義者」，那麼如何解釋他們的那些反國家言論？如果認為創造社表現出了「民族主義」，那麼這種起源於歐洲的、作為反思啓蒙運動普世思想而出現的現代思想，是以怎樣的方式為創造社所接受的？在這種接受中是否存在誤讀？如果他們是崇尚「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那麼如何理解他們對「國民文學」的提倡？如果他們曾經表現得像一個「民族主義者」，又是什麼因素使他們從民族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創造社作家國家想像的形成和嬗變不僅反映了創造社一個團體的文學創作走向和思想變遷，也折射出晚清以來直至 1920 年代末，經歷了社會進化論、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啓蒙思想、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等諸種西方思潮衝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心靈圖志。釐清這一問題還將有助於從一個新的視角審視「創造社的左翼轉向」這一中國現代文學史難題。創造社的「左轉」正式開啓了中國的左翼文學，他們的這段留日經歷可以視為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史前史的重要部分，從這一意義上說，創造社史也可視為中國左翼文學史前史。創造社這些留日作家與後來「左聯」時代那些明確信仰馬克思主義，抱著對自己的「左翼」身份的充分自覺而赴日的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個很大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旅日之前並無「左翼」身份意識和馬克思主義信仰，儘管其中一些人在國內也曾參加過激進的學生運動，但他們從「小資產階級藝術家」到「革命文學家」的「方向轉換」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民族」、「國家」、「國民」這些通過留學生活而明確起來的意識。

伊藤虎丸的創造社研究基點始於「竹內魯迅」，這也成為他考察創造社的關鍵參照。他在討論創造社的民族主義時，曾經設立了兩個對比系：受排滿

與漢思想影響，堅持區分代表著滿清異族統治的「國家」與己身所屬的漢「民族」的魯迅，和以「藝術家意識」對抗「國家」和「民族」一體的日本國家體制的大正日本文學家。認為魯迅的「個人」代表著「與封建社會人的奴隸性相對立的『獨立』意志（道德反骨），代表著具有主體性的理性的現代『精神』」；而創造社的「個人」則代表著「感性的現代『自我』，與落後的農村對立的都市的現代感覺。」〔註 20〕因此，同樣是在日本感受到民族歧視，魯迅得出了國民性改造的需要，接受了日本的「先進國——落後國」思維模式的創造社作家則將之歸因於中國的落後，並因此而焦慮不堪。另一方面，創造社作家和大正日本的文學家們一樣，崇尚超越國家的「自我」意識，卻出於不盡相同的理由：前者因為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狀況太過令人絕望，後者則是因為需要逃避明治以來已成「不動之體制」的國家強權。而且，在日本受到的民族歧視以及不斷加深的民族危機，最終使創造社作家返回到那個「在自己的內心」中將「國家的價值（或者對他們而言，應該說是民族的、乃至政治的價值）擺在第一位」的精神構造，而沒能創造出超越國家的東西。這也正是創造社作家與大正日本作家的關鍵不同之處。〔註 21〕

武繼平和蔡震在他們有關郭沫若的個案研究中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觀點。武繼平注目於個體與國家的關係，他在討論《女神》時指出，「當時的留學生郭沫若不僅僅是一位詩人，而且還是身在異國相當活躍的愛國主義者」，因此「郭沫若的『自我』的背後總是映著民族和祖國巨大身影。」〔註 22〕與此同時，郭對祖國的感情中也包含著從「二十一條歸國事件」中開始意識到的「國家」與「自我」的矛盾，傳統的士大夫憂國意識與在日本吸收的現代的「個」的苦悶之間的矛盾。蔡震則強調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日本這個參照系對郭沫若的國家、民族意識的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日本留學經歷使郭沫若獲得了一個從外國審視本國的機會，特別是「二十一條」事件使他的關於國家、民族的概念發生了變化。國家「不再僅僅是某一個自己直接面對的政府、一個政權」，也是「位於世界版圖上的一個民族的實體」。通過與

〔註 20〕 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東京：アジア出版，1979年，第64頁。

〔註 21〕 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東京：アジア出版，1979年，第81～82頁。

〔註 22〕 武繼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第244頁。

日本進行比較，「郭沫若頭腦裏關於國家、民族的觀念和意識更加清晰，更爲理性，也大大增強了」，日本留學經歷可謂「構成他愛國主義精神的一道煉獄」。(註23)

以上研究成果顯示，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生成，對國家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對民族國家共同體形象的想像，對自我與國家關係的認識中存在著許多複雜的思想脈絡、許多曲折的變化未曾理清，不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可以簡單概括之。本文所討論的「國家想像」，包括對於現代國家概念的接受，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生成，對自我與國家、民族、國民等關係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關國家形象的想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界定爲「想像的共同體」，認爲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正在於它們「被想像的方式」。(註24)想像不是虛構，亦不完全是真實。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中既包含了他們對中國現狀的觀看，也包含了對國家應然形象的想像。國家想像的變化則反映著個體國家意識的變化、對於國家共同體的認同與疏離。作爲留學地的日本向創造社的作家灌輸了現代的國家意識：包括「富國強兵」的口號、崇尚國家間競爭的社會進化論思想、國家主義、以及「國民國家」的樣板；也爲他們提供了反思國家的思想工具：浪漫主義和教養主義。此外，留學本身帶來的特殊生存狀態也影響了他們觀看和想像故國的方式。因此，本文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層面考察日本留學對創造社作家國家想像的影響：「我」與國家的關係，國家與民族的關係，以及「我」與國民的關係。

本文將首先討論創造社作家的自我與國家的同盟是怎樣在「富國強兵」的思想和「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建立起來的。創造社作家對「富國強兵」的思想經過了一個從信仰到反對乃至厭惡的過程。這一清末民初留學潮的核心思想是促使創造社作家走上留學路的關鍵因素，而在日本留學期間和歸國後，他們又不約而同地發出過批判「富國強兵」的言論，對自己當年信仰的思想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撥正可見當日所受影響之深。周海林在其博士論文中觸及了「富國強兵」對近代以來中國人思想的影響，以及因爲接受了該思想而選擇留日的創造

[註23] 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20~24頁。

[註2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5年，第6頁。

社成員的兄長們對他們的影響。周海林將個體選擇是否服從於國家需要視為留日第二代的郭、郁、成等前期創造社成員，與留日第一代的他們的兄長間的重要不同，認為後者以建設現代國家為己任，對自我和個人無暇顧及，而前者由於接受了「由新文化運動而滲透的科學精神和民主主義思想」，開始關注個體的存在意義和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人格價值，這成為他們從實學轉向文學的最關鍵的原因。^{〔註 25〕}周海林提到的現代自我的覺醒——郁達夫所謂「個人」的發現——的確是促使創造社成員從實業轉向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本文將嘗試論證的是，創造社作家因接受「富國強兵」思想而開始形成的、個體與國家命運相聯的意識，並未隨著他們接受「五四」精神和伊藤虎丸所謂大正日本的「藝術家意識」而產生的現代個體自覺而消失，選擇從實學轉向文學，正如《沉淪》所展示的那樣，並不意味著「國家」的退場。因此，本文第一章將在梳理以「富國強兵」為指導思想的清末民初留學潮背景基礎上，從考察創造社成員的留學動因、留學制度、由官費所反映出的留學生活狀態等問題入手，由此透視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留學潮是如何塑造了創造社作家有關個體與國家關係的認識，當時的留學制度、民初教育經費恐慌所導致的留學生官費滯納狀況又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國家的看法。

形成國家想像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對於「國家是什麼」這一概念的認識。第二章將討論在「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中，創造社作家是如何通過日本接受了「國家」、「民族」、「種族」、「國民」、「國民國家」這些現代概念。對這些概念的日本式闡釋，留學期間對日本現代「國民國家」體制和日本「國民性」的觀察，對「國民性」理論的接受，又是如何影響了他們對自我與國家、國民關係的思考。

陶晶孫說創造社因遠離故國而生懷鄉病，而這懷鄉病中有幻覺與幻視。鄭伯奇也提出正是因為目睹故國與異國的差距，以及從異國到故國所生的兩重失望、雙重痛苦，才將創造社推向了浪漫主義。可以看到，久居異國後的還鄉體驗，以及觀看故國的方式對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影響重大。因此，第三章將考察創造社作家還鄉敘事中對「還鄉體驗」的講述，主要採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方法，考察創造社還鄉敘事中所反映出的觀看和想像中國的方式，以及西方浪漫主義的經典情結「鄉愁」是如何被運

〔註 25〕周海林《創造社と日本文學：初期メンバーを中心として》，早稻田大學博士（學術）論文，2002年，第23頁。

用到創造社的還鄉故事和故國想像中的，上述還鄉體驗又是如何造成了他們國家想像中「中國形象」的分裂。

第四章將主要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重點討論由還鄉體驗而產生的國家想像的變化，是如何影響了創造社作家的創作和思想走向，分析 1920 年前後，也就是他們歸國還鄉前後這一段時期作品中所出現的去國者、混血兒、吟遊詩人這些游離出國家共同體之外的形象，以及伴隨這些形象出現的對國家主義所作出的反思和批判。

最後將考察創造社對「國民文學」的提出、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董炳月曾將「國民作家」作為近代以來中日兩國作家的一種共通特質，因為民族國家是雙方都避不開的歷史大背景：「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作家和日本作家都是在國家意識形態強化、民族主義精神高漲的大背景下展開自己的話語行動。在民眾被高度『國民化』的時代，作家不可避免地被『國民化』，於是成其為『國民作家』。」〔註 26〕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則論說 20 世紀初，剛剛從傳統士大夫轉型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通過塑造「國民」來確定己身形象。〔註 27〕無論是否自覺為「國民作家」，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必須處理自身與「國民」的關係，創造社作家同樣需要面對這一問題。「國民」在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圖景中一開始並非主角，而是當他們感覺到有必要重新調整「我」與國家的關係，構建一種新的國家形象時，才開始將目光投向「國民」。「國民文學」的實踐通過將「民族」從「國家」中分離出來，通過描寫「國民」，重新構建了一個「我」與民族國家的新同盟。「國民文學」的提出標誌著創造社開始重新審視「國民」的存在，由此也為他們不久之後的左翼轉向奠定了基礎。

本文是以擁有日本留學經歷的創造社成員為對象的研究，因此，文中所使用的「創造社」，除非特別說明，均指旅日創造社成員。所引外文文獻，除注明譯者之外，皆為本文作者所譯，篇幅所限，原文從略。日文文獻中出現的「支那」、「對支」等用語，因其為歷史名詞，翻譯時一律不作變更。所引文獻中著重號皆為原文所有，明顯錯字、漏字將在〔 〕中注出或補出正字，無法辨認的文字、符號等皆以□代之。

〔註 26〕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第 238 頁。

〔註 27〕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83 頁。